

手法改變主要條文。當平成年代走向終結時，日美同盟的軍事層面比過去更為緊密，但1947年憲法會否修改，事實上仍無法肯定。

平成時代不是終結於天皇的逝世，而是他的退位，這在近代是史無前例的。在皇室制度漫長的前近代時期，退位是十分普遍；約超過半數的天皇選擇退位，而且通常是在相對年輕的時候。但在近代史中，三位前任天皇（明治、大正、昭和）只有在其去世時才終結統治。無論是明治時期與憲法一起頒佈的《皇室典範》，或是戰後憲法下所採用的「新皇室典範」，文字上都假設天皇是終生職務，沒有關於退位的條文。在這個背景下，明仁天皇宣佈他有意在2016年夏天退位，實在令許多人訝異，雖然他身邊的顧問好幾年前已了解他的心願。他在一個公開演講裏解釋，由於身體狀況惡化，他無法正常執行許多公務。雖然只是政治象徵的活動而非實行主權，但其所包涵範圍事實上相當廣泛。

執政黨並不滿意明仁天皇的聲明，也許因為害怕出現「國家和人民團結」兩個符號共存的情況。經過自民黨內部、政府與宮內廳以及國會裏一連串的爭論，政府在2017年3月通過一項法案，僅准許這一次的退位，以後的退位需要未來再立法。2019年4月1日，政府宣佈新繼任天皇的年號為「令和」。這個決定有兩點不尋常：首先，以前二百四十七個天皇年號都是由中國經典裏選出複合字，反映出日本早期文化以此作為基礎。但「令和」一詞則不同，出自日本古代詩歌集《萬葉集》。其次，「令」這一字指早春月份，以前的年號從沒有用過。4月30日舉行退位典禮後，平成時代正式結束。翌日，德仁太子成為新天皇，他的妻子小和田雅子成為皇后，令和時代於是開始。在這個年號下，安倍政權強調國家的光榮，也希望擺脫隨附著平成時代陰冷而又衰落的敘事，當然，日本人民仍要面對存在的各種困難。

五、平成時代的總結

人們會怎樣總結平成年代，尤其是它最後的幾年？明仁統治的開端碰上日本1990年代的「失落的十年」，到了2010年代初，它又適時地被稱作「失落的二十年」。失落的形象源於揮之不去的經濟疲弱

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還有出生率的下降和日本社會的急劇老齡化。根據2015年的人口調查，約27%的人口是六十五歲或以上，政府預估到2040年會增加至35%。但要化解這些令人困擾的趨勢需要時間，失落的形象成為一個大敘事，它有自己的生命力，甚至遮蓋了日本的堅韌性和穩定性，而這些正面力量其實是一直存在的。2012年12月政權回到日本長期的執政黨手裏，其後日本政府和保守派主流用盡方法要把大敘事變為正向，這種做法歌頌了成功的地方，但相反地掩蓋了依然存續的問題。

安倍晉三2006年至2007年首次登上總理寶座，但這段時間是一事無成，現在重拾舊江山，當然十分高興，因此設定新調子，宣言「日本會再起」。安倍再起是沒有疑問，但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是，他能留任到平成時代的結束。他的口號其實比三年後特朗普的「令美國再次偉大」更早一些。2013年9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宣佈日本將會在東京主辦2020年奧運會，為安倍更美好將來的承諾加了一把勁。這也引發一個建築榮景。當日本社會的男女工作人口正在萎縮時，它加劇了日益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官方的樂觀立場是建立在對日本過去及未來的正面評價上，但並非人人都同意。2015年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七十週年，安倍首相及其國會支持者以至其他派系——尤其著名的是團體「日本會議」，他們的立場是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政府要負上招募和囚禁韓國及其他地方女性於所謂慰安站的責任。「日本會議」號稱全國有四萬會員，包括參議院裏約60%的議員（大部分是自民黨員）。它的民族主義綱領包括修憲、反對日本向二次大戰時的殖民統治和行為道歉。安倍無疑同意這個立場，也毫不隱諱希望擺脫日本過去在大戰五十週年和六十週年的聲明，這些聲明試圖為戰時侵略和殖民地化其鄰國的行為作較為明確的道歉。2014年末至2015年夏天，中國和南韓政府、還有亞洲和西方的積極分子都顯得十分焦慮，並多方批評，使得日本與其鄰國關係降至冰點。因此在日本投降的週年活動，安倍要為其政府發表聲明時，他的實用主義戰勝其民族主義，有效地躲閃了道歉問題。安倍把其前任1995年和2005年聲明裏的四個關鍵字放進來——「痛切反省」、「深刻哀悼」、「殖民地

統治」和「侵略」，希望能抑止海外的譴責。與此同時，安倍的行文遣字卻反映出他的民族主義複雜情緒。他強調其前任的道歉，但卻沒有用自己的語言表示歉意；他突出日本自1945年以來對世界的和平立場，但企圖免除其後任者仍須繼續道歉。「我們不應該讓我們的子子孫孫或更未來的一代背負謝罪的宿命，他們與戰爭毫無關係。」在結論裏，安倍表示：「雖然如此，我們日本人應超越世代，認真面對過去的歷史。」³⁷

同年夏天出現另一個有關的爭議，日本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一些船塢、煉鐵廠、煤礦作為「世界遺產」，用這些地方紀念第一個非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南韓政府揚言否決日本提案，因為日本只聚焦在明治時代，沒有提及戰時從亞洲大陸送去日本工作的勞工受遭受的不人道待遇。最後達成一個奇怪的妥協：日本承認中國和韓國勞工在戰時被迫到這些地方工作。而怪異的原因在於，日本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時，完全沒有提及數以千計的日本男女工人所遭遇的嚴苛環境，包括那些自上述礦場和船塢成立後便參與工作的囚犯勞工。

同年12月，日本與南韓就歷史問題的緊張情況達成協議，稱為「慰安婦問題」的「最終」協議。日本政府會給予活著的慰安婦進一步的補償，而南韓政府則中止對日本的官方批評，不再談及戰時和最近有關這些女性的處理。日本的右派反對補償，因為這等於變相承認國家負有道德責任。南韓的輿論亦譴責這個協議，因為它沒有明確指出日本的法律責任。

雖然有這些批評，「歷史問題」的確安靜了好幾年，但到2018年秋天，仇恨之火又再燃燒起來，因為南韓最高法院裁定日本一間大型鋼鐵廠須賠償二次大戰時四名被強制勞動的韓國勞工。日本鋼鐵廠和政府表示強烈不滿這裁決，理由是1965年兩國正常化協定已對所有賠償問題作最終解決。但日本政府同樣發出更含糊的聲明，認為戰時徵用韓國勞工不等於強制勞動，這顯然違背了其2015年解決世界遺產爭端時所作的讓步協議。其後一年間，雙方的互相指責愈演愈烈。南韓其他年老勞工也向法庭提出訴訟，要求賠償。安倍則把糾紛延伸至貿易和國防領域，以作報復。他對出口南韓的化學材

料增加了一些找碴的新程序，因為它們有「國安疑慮」，而這些材料只有日本才能生產，它們是南韓高科技廠商生產如屏幕等商品所必須的。而南韓的回應則是中止與日本的協議，不再分享有關北韓的軍事情報。歷史問題明顯仍是日本與其他國家關係長久以來的陰影，尤其是與其亞洲鄰國。

2018年也是1868年明治維新的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給予了日本政府另一個機會慶祝其近代化的成就。這件盛事有點像1968年明治維新百週年，卻不像1945年的七十週年，只引起世界一般關注。數以百計的慶祝活動在日本全國舉行，與明治維新百週年一樣，他們慶祝近代化的成功，但沒有提到一般百姓所付出的代價。與1968年也有不一樣的地方，當時很多史學家認為日本近代史就是戰爭與帝國，不會有值得慶祝的地方；但到一百五十週年紀念，這方面的爭議很少。與其他國家人民一樣，日本的大部分民眾，如同他們的政府，總喜歡回顧過去積極美好的一面。³⁸

從2014年開始，安倍政府除了推動對歷史更正面的看法外，也呼籲女性擴大她們在職場的參與，他的口號是「一個讓女性發光的社會」。這個運動並非來自女權主義原則，安倍在下面的聲明說得十分清楚：「有些人可能會感到泄氣，因為保守政治家安倍晉三正在推動一個『讓女性發光的社會』，但我認為這不像過去的社會政策，而是作為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支柱。也許可以這樣說，婦女整體是一座寶山，但她們的人力資源過去並沒有得到好好利用……我希望能讓所有幹練的婦女盡快為推動日本前進出一分力。」³⁹這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戰前和戰爭期間的呼聲，要求婦女為「貢獻國家」而犧牲，作為人力資源發揮最大作用，以建立一個強大的國民經濟。

在其後的幾年裏，婦女參與勞動力的比率繼續慢慢增加，主要在不同工種擔任非正規職位。政府表面上促令私人企業提高女性和管理階層的比例。到2017年，這數字稍有增加，但比例仍是普通的10%。態度確實有某種程度改變，由1992年開始，一項定期的政府調查會問到「是否應該由男性在外工作，女性負責家務」。反對男性賺錢養家這模式的人士，由第一次民調時的40%升至2016年的60%，而支持這個模式的百分比則相應降低。⁴⁰

373

雖然是稍有進步，但2018年夏天一宗醜聞卻反映出在高層中，性別角色的保守看法仍是根深蒂固。日本其中一所最著名的私人醫學院，被發現在過去十多年來一直有系統地限制女性入學比例在30%內。每一年的決定性入學試中，負責招生的管理人員都偷偷扣減所有女考生的分數。參與這種做法的人卻振振有詞，認為准許女性接受醫學教育是一種浪費，女性畢業生通常都比男性更早退出職業生涯。⁴¹在過去十年，全國入讀醫學院的女性完全沒有增加。再進一步調查則發現其他地方都有同樣情況發生，因為男性通過醫科考試的數字明顯高於女性。這事件反映出倡導婦女更大的參與，無論是基於實際的經濟策略還是原則問題，仍要面對持續的挑戰。

除了具體呼籲女性幫助重振經濟，縱使其支持前後不一致，日本政府在2013年還展開一連串稱為「安倍經濟學」的宏觀經濟政策。這個計劃包括「三支箭」：財政刺激，批出大量預算給橋樑、隧道和公路的建設；採取史無前例的積極貨幣政策，並行使負利率（稱為「量化寬鬆」）；還有一套大而無當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目的是刺激投資及增強競爭，裏面包括降低企業稅、鬆綁企業規例、自由化勞動市場及農業部門（過去自民黨一直有保護，安倍尤其明顯）。「三支箭」的目的是推動國內生產總值成長，同時引發每年2%的溫和通貨膨脹。

五年來的結果既不令人印象深刻，也沒有造成災難。通貨膨脹沒有達成指標，意即消費者仍會延後購買，因為他們預估未來價格會繼續下跌。雖然2015年至2017年經濟每年以接近2%持續增長增長，企業獲利上升更快，整體經濟成長仍然微弱。人口下降已成為日本常態，外來移民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平均個人所得增長與別的國家相比較，其實算是相對強勁。2017年到2019年的失業情況與過去數年比較，仍處於最低水平，甚至每年2%的成長也創造相當多新工作崗位，建築及服務行業均出現嚴重人力短缺，例如長者護理。⁴²

一個回應的政策是稍為放寬外籍勞工限制。2018年12月，自民黨在國會推動一項法案，為海外高技術、半技術及無技術工人各自設立新的簽證類別。前者可以帶同家人，而且在最初五年簽證期滿

後，可以無限續簽，其目標是在五年內帶來最多三萬四千五百名工人。相比起勞工短缺情況或整體勞動人口，上述數字並不算多，同時也不一定能夠達成。但新政策仍然重要，因為日本政府至今為止仍倚賴女性和老人，並未把外國人看作勞動力來源。

雖然人力持續短缺，但實質工資沒有增長，甚至下降。為甚麼勞工不足，企業賺錢，而平均工資卻沒有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縱使有一個工會能替工人說話，正規工人要求的是工作保障，而不是工資增加，同樣重要的是大部分新工作都屬低薪的非正規職位。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在面對低增長和通縮問題，與其他國家並無二致，尤其是歐洲。甚至在美國，它的經濟成長步伐較快，但很多新工作的薪水仍低，工資也停滯不前，甚至實質上是下降。

374

2016年，新當選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喜怒無常，曾激烈批評日本的貿易行為，並認為在軍事同盟上，日本「坐順風車」，佔盡便宜，安倍非常了解這點，他是美國所有盟邦的領導人中最努力與特朗普建立密切個人友誼的一位，其著眼點是在經濟和軍事議題。在2016年11月美國選舉後幾天內，安倍便訪問特朗普大廈；他也是在特朗普就職後不久，第一批與其會面的外國領導人。據說除了打了幾回合高爾夫球外，安倍是空手而回。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後，其首批作為之一便是要美國退出稱為「跨太平洋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的貿易協定。太平洋兩岸十二個國家已經為了這個複雜而廣泛的協定努力了接近十年的時間，到2016年貿易談判代表終於達成協議，唯一剩下來就是等待各國的行政和立法部門批准和簽署。日本政府簽署了協定，因為相信日本經濟會受惠於一個更開放的貿易體制。而安倍一直努力克服國內的反對，尤其來自農民方面。除了上述的傷痛外，特朗普在2018年更給予安倍另一個羞辱，向日本的鋼鋁產品開徵關稅，但卻豁免美國的其他盟友，無疑打了安倍一記耳光。後者的經濟衝擊是溫和的，因為日本根本很少出口鋼產品到美國。但美國脫離TPP會給日本帶來多少損失則更難估計，因為這協議從未生效。日本希望與其他十一個國家達成一個修正版的TPP，然而縱使最後達成協議，沒有美國的經濟參與，它的效應會非常一般。

雖然安倍治理下的日本尋求與特朗普總統建立密切關係，而且它所面臨的經濟及社會挑戰與美國或歐洲類似，甚至可能更巨大，日本在平成末年的政治世界並沒有經歷在美國冒升的民粹民族主義。最有可能的解釋是日本本身只收納數量極少的「他者」——也就是族性和種性明顯不同的移民，當政客為了攫取支持，尤其當主流族群或種群成員生活不如意，「少數他者」通常成為政客操弄的目標。這些住在日本相對少量的「外來者」在2010年代面臨愈來愈多煽動仇恨的種族團體，包括「反對給與在日特權市民協會」（簡稱「在特會」），其中尤以韓國人為標的，他們的家庭其實已來了日本好幾個世代。假如日本的少數族群人口更多一些，對排外民粹主義的反撲可能更全面一些。除此之外，安倍本身的政治立場成為某種由上而下的民族民粹主義，反而令自下而上或由體制外而來的民粹主義難以著力。

與經濟政策及鼓勵女性走向新角色的努力一樣，日本的能源和環境政策在平成年代末期顯得步伐雜亂，忽然前進，忽然後退。在2011年3月的雙重打擊到臨時，日本有五十四座核能反應爐在運作，它們提供全國30%的電力。當時執政的日本民主黨誓言要在四十年內清除所有核能，並保證儘量使用再生能源以補救電力的缺口。當自民黨在2012年末重掌政權，它希望重啟至少部分核電站，一方面是經濟上的實用做法，另一方面出於「綠色」理路思考，安全的核能電力不會產生溫室氣體。自民黨有充分的理據關注日本逐漸增加的碳足跡。3.11災難後，所有核能電廠都停止運作，這30%的電力不足則由增加進口煤炭（25–31%）、天然氣（29–46%）以及石油（7–11%）來彌補，再加上上升了2%的再生能源（太陽、風、水力）。

雖然決意要將核能電力恢復到國家能源結構，但面對核能是否安全的廣泛而持續的疑慮，日本政府在2013年建立嚴厲的新核電站規範標準。直到2018年為止，只有五間核電站及九個反應爐合乎那個成本高昂的新標準，可以恢復運作。另外五個反應爐雖通過規範的難關，但由於地方反對，重開的前景並不明朗。十九個反應爐則被封，準備退役。⁴³

2018年，政府公佈一個新的長期能源計劃，目標設定至2030年。該計劃把國家能源結構分為四個大致相等的部分。核能仍是一個重要來源，雖然作用會減弱，約佔整體能源供應的22%。再生能源會提供24%，煤炭為26%，而液化天然氣(LNG)會提供27%。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只佔整體能源1%。很多觀察家懷疑上述目標能否達成，因為核能電力要達到上述水平，需要約三十座反應爐運作。⁴⁴

民眾懷疑國家有沒有能力處理好環境問題，這並非新鮮事，也不只限於核能議題。在2011年災難以前，這種疑慮最常見之於愈來愈多人反對興建新水壩，或是要求拆毀舊水壩，因為它損害地方環境，所得的好處則十分微薄。在極北地方，2007年開始整治北海道的釧路川，要把它原來彎曲的河道恢復過來；在極南地方，工程師要拆除熊本縣的荒瀨水壩。有些環保主義者認為日本這個建築國家只不過用新方式為自己找事情做，但有些科學家則認為在上述地區可以找到生態恢復的證據。不過興建水壩這種現代傳統仍到處繼續，東京上游的大型八場水壩，經過半世紀的反對和延滯，終於在2019年接近完成。⁴⁵

* * *

把平成年代的最後十年放進更大的世界史背景裏考察是重要的，能讓全球趨勢與地方事件的關係更形清楚。由全球視野來看，雷曼兄弟危機的震撼是三十年來對市場放鬆管制、過分崇拜的結果。由1980年代開始，第十五章裏所談及的生產力政治嚴重腐蝕北美、日本及部分歐洲與拉丁美洲地區。上述地區在1950至1970年代都曾經讓工人可以有較高收入，從而成為經濟上積極、政治上有吸引力的良性循環的一部分，該循環產生了消費需求，繼而促進企業獲利並再投資，進一步推動薪水增加，重新刺激需求。但新自由體系取代這種規範性的市場經濟，傾向注重投資者和僱主的利益，而不是僱員和消費者。當這改變在全球出現時，日本剛好面臨一系列特殊的社會趨勢：高齡化社會、人口萎縮，以及更缺乏保障的僱用形式。雷曼危機的衝擊和緊接而來的雙重災難，與上述持續的趨勢交錯，引發出其後數年間政治激進主義的崛起，領導者是那些常被

媒體批評為自我封閉或軟弱的年輕一代。但問題依然存在，2009年抗議失去工作機會、2012年關注核能問題或2015年反對與美國更緊密的軍事關係，究竟上述展現出來的政治能量能否持續？另一個可能是，對權力愈來愈不信任將會導致冷漠和退縮。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尾聲，剛好碰上平成時代的結束，日本可以說處身在全球後災難、後現代環境的前沿：迅速老齡化、經濟上雖然有新工作但發展並不理想、全球暖化不斷衝擊。在這種環境下，並非日本的所有經驗對世界而言都是消極的。日本經濟節能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日本政府承諾要為應對氣候變遷付出更多，雖然實行起來很多時候是半吊子，但這些努力仍比某些主要國家來得大。犯罪率仍低，城市和鄉鎮都十分安全。公共交通工具十分有效率，而且非常方便。城市的基礎建設投資仍蓬勃。貧富不均的情況雖有增加，但比起其他地方不算嚴重。軍事開支上升，但在整體經濟所佔百分比仍低。在2000年，日本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早使用公共資源系統長期照顧老人的國家，到2019年仍是少數國家之一。無可否認，人口正在老齡化，但可以引以為傲的是，日本是最長壽的國家。雖然不能毫無批判地接受日本政府在慶祝明治維新一百五十週年時的正面論調，但可以想像，假如其他地方的人民能面對與日本同樣的挑戰，他們應會感到高興。也許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是，對一個國家、社會以至個人來說，甚麼才是成功的標準？